

暴雨洪涝“洗礼”出什么？

逾千万人受灾，过百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百亿元——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最新统计，4月1日以来，全国16个省份遭受暴雨洪涝和狂风的袭击。

狂风卷走了宝贵的生命，暴雨摧毁了脆弱的家园，洪涝击中了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地下的软肋——暴雨洪涝“洗礼”出的警示发人深省！

羊城二度成“水城”：“重地上轻地下”的模式再鸣警钟

全市102个镇(街)受水浸之灾，109间房屋倒塌，市区发生44处严重水浸，交通一度瘫痪，街道变河流，商铺、学校“水漫金山”，地下停车场变游泳池，小汽车成“潜水艇”……这是5月7日特大暴雨给广州留下的记忆。

14日，一周以来第三次强降雨再袭广州，降雨强度和过程总降雨量超过了5月7日。这一次，广州发起了一场抵抗暴雨内涝的“全民动员战”——气象部门提前预警；城管、水务、民防、排水抢险等部门紧急投入抢险；市民自备沙包避险自救。因为预警、响应、排水更快，救援更及时，这一次特大暴雨广州市区受浸点

从5月7日的118处减少为99处。

即便如此，14日暴雨来袭时，记者在广州街头看到，原本四通八达的中山立交及天河立交，在暴雨中顷刻化作一片汪洋，水已深及大腿。有专家指出，作为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城市，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仅仅减少了19处受浸点，“不足以说明未雨绸缪的效果，反而更加暴露了城市公共管理和应急机制中的软肋，以及市政规划建设中的硬伤。”

“重地上轻地下”，在专家眼中，这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通病，隐藏在漂亮的高楼大厦下面的，是城市脆弱的排涝系统。

广东省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所长段华明介绍，我国城市排水设施设计沿用前苏联模式，称为下水管网，口径很小，难以对付大流量的来水。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下水系统是能在里面撑船，排涝能力很强的“地下运河”。广州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偏低，中心城区现有排水管道达到一年一遇标准的占到总量的83%，而达到两年一遇标准的仅占9%，一旦发生强降雨就容易出现中心城区大面积水浸。

“孤岛”“零伤亡”：奇迹过后的无奈

“封桥之后不到4个小时，128米长、20米宽的大桥就轰然倒塌。如果没有及时封桥，后果将不堪设想。”湖南省溆浦县善溪乡乡长何石光指着善溪大桥旧址对记者说。

5月12日至5月13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山洪袭击了湖南。在受灾最严重的溆浦县，强降雨使全县4座大桥被洪水冲毁，善溪乡与外界交通几乎全部中断，8000多群众陷入

“孤岛”无法出行。而在两江乡朱溪镇，两座村小学被洪水吞噬，两座桥梁、5条铁索桥中断。

尽管洪灾百年不遇，但溆浦县两江乡和善溪乡的2万多群众却无一人伤亡。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零伤亡”奇迹绝非偶然，湖南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山洪灾害防御组织体系，在灾害来袭时发挥了作用，乡政府转移疏散工作得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两江乡朱溪村村民戴复和说，早在5月12日晚，镇上的干部就挨个给村里打电话，并连夜组织村民转移。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5月13日早晨，当时有40多名修建河坝的外来民工住在临河的房子不肯转移，在乡政府干部软磨硬泡后，这40多名民工刚转移不到5分钟，身后的房屋就轰然倒塌。“如果不是乡里干部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并亲自驾排疏散群众，在这么猛的山洪袭击下，全乡1万多人‘零伤亡’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奇迹过后，这两个乡的居民却面临家乡“不宜人居”的无奈。

“虽然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从地形上看，朱溪镇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两江乡乡长刘岳清说，“朱溪的上游新化山区是湖南的一个暴雨中心，一旦发生强降雨，附近20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山洪就全部汇集到几条狭窄的河道，而朱溪镇地处群山环绕之中，除了沿江两岸，很难找到一个适合建设居民区的地方。”

记者在溆浦县、新化县等地采访时发现，与朱溪、善溪类似的山区聚居地十分普遍。而这些地方多年来降雨时空分布极为不均，极端的干旱或洪涝灾害时有发生。这些中小河流容易发生山洪灾害，抗灾能力不强，大部分中小河流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多年的人类活动造成人为侵占河道严

重，常常导致“小流量、高水位、大灾害”现象发生。

在朱溪镇做小生意的刘道亿家中的价值20万元货物被洪水席卷，他一边收拾着从淤泥中刨出来的几百元残货，一边喃喃地说：“看来这个地方是不能再住了，可我们又能搬到哪里去呢？”

专家提醒，每当灾害袭来，人们习惯于使用“50年一遇”“百年一遇”“最强”“罕见”等词语来形容其偶发性。然而，偶然中有必然，如果不摒弃“重建轻规划”的旧有观念，没有防患于未然的合理人居规划，概率再小的灾害一旦发生，引发的将是巨大的危机。

千年福寿沟：古排水工程的现代启示

13日到14日，江西省赣州市出现暴雨，24小时降水将近百毫米。倾盆而下的雨水，并未让赣州这座千年古城发生明显内涝。赣州市古老的城市排涝设施——福寿沟仍在地势相对较低的老城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赣州三面环水，是赣江的发源地，章江、贡水在这里合流而成赣江，使得这里自唐宋建城以来就为内涝所困。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刘彝任虔州知军，主持规划建设了赣州城区的街道，并根据街道布局、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建成了福沟和寿沟两个排水干道系统，服务面积约2.7平方公里，有12个出水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排水干道网。

赣州市文物局局长韩振飞介绍，福寿沟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极有创造性的城市排水雨污合流制综合工程，不仅是“宋城赣州”的一处重要文物，而且历经近千年风雨至今仍是赣州市老城区10多万居民日常排

污水的主要通道。

赣州市水利局副局长钟永浩介绍，福寿沟是一个主次分明、排蓄结合的排水网络。福寿沟与沿线众多的池塘连通，这些池塘在暴雨来临时可以调节流量，减少下水道溢流，平时还可以养鱼种菜，形成生态环保循环链。

韩振飞说，在有记载的近几十年内，福寿沟范围内的老城区只在1992年由于城区建设阻塞了福寿沟发生过一次较大的内涝，后经清理维修至今再无内涝发生。

专家认为，作为古代城市排水工程的智慧结晶，福寿沟精湛的设计和工程设计容量的超前性值得当今城建部门借鉴。赣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养护处办公室主任王荣洪说，福寿沟工程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利用城市地形的自然高差，全部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做好城市绿地和水体的保护，形成一定的雨水蓄积能力，使城市的雨、污水自然排入江中和濠塘内。韩振飞说，福寿沟宽90厘米、高180厘米的断面，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令人赞叹”。

为什么古人建设的排水系统历经近千年而不衰，而在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今天，我们的城市排水系统如此脆弱？

给排水专家、南昌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李益飞说，原因之一在于目前我国城市排涝工程的标准规范太低。他说，水利部原来的城市排涝标准是防御20年一遇的暴雨，目标是“一日暴雨一日排干”。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密度的不断提高，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这些标准早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菜价波动十分明显，然而统计数据却与百姓的感受不对称；在不少情况下，菜价上涨菜农并不受益，吃菜一年比一年贵，为何出现这些现象？记者在鲁浙赣等地区进行了调查追踪。

统计数字猛跌，百姓感受不彰

从统计数字看，近日来蔬菜的总体批发价格和5月初相比有了大幅回落。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目前的蔬菜总体平均价格与5月1日相比，降幅已达到20%左右。以西红柿为例，5月初新发地市场的西红柿批发价达到每500克2.2元，到5月16日这一价格跌到1.45元，跌幅接近35%。然而，很多买菜的人却感觉不明显。

记者在长椿街附近的一个菜摊上碰到了前来买菜的北京市民李阿姨，她对记者说：“电视上都说菜价大跌了，我天天买菜，为什么感觉不到跌了那么多？”在杭州、南昌等地，不少市民的感受也大致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浙江省农业厅首席蔬菜专家赵建阳说，一方面原因是发布的监测数据多为批发价格，而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相关的是零售价格；另一方面跟农产品的流通方式相关，从“菜园子”到“菜篮子”存在过多的中间环节，利润层层剥皮，价格层层加码。每道环节为了保证自身利润，涨价及时，降价却滞后。

“从‘菜园’到‘菜篮’往往要经历菜农——菜贩——批发市场——零售——消费者这些环节，甚至还要多。每道环节都想利润最大化，自然就涨起来快，降下来却非常慢。”长期从事农产品流通的浙江省农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慧智说。

由于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许多蔬菜在流通中还要走上

透视部分地区菜价波动现象



不少“冤枉路”。“比如说北京市场上的一部分河北蔬菜，因为找不到直接销往北京的途径，也要先贩到寿光去转一圈再回头进京。”赵建阳说，这种相对落后的流通体系无疑也撑大了蔬菜成本。

菜价一路上涨，菜农并不增收

在“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稻田镇西刘营村菜农刘明山家里种了一半地小黄瓜，他告诉记者，今年菜价是很高，但种菜利润并没增加。“小黄瓜春节价格最高时卖到了每公斤18元钱，但当时天气冷，产量少，一个大棚一天只能摘20多公斤。尽管这几天价格跌到了每公斤2元钱上下，但产量上来了，赚的反而比18元1公斤时多。”

接通浙江蔬菜种植户蓝小波的电话，一听是谈菜价问题，蓝小波马上对记者叹了口气：“哎，你们都说菜价‘发高烧’，实际上我们种菜的一点好处没捞到，因为天气不好，价格上去的时候产量下来了啊。我地里的苋菜因为倒春寒减产了两成以上，价格最高的时候卖到10元1公斤，但一茬菜下来利润没增加。”

菜农们告诉记者，因为没有定价权，因此自己并没有办法在蔬菜价格上涨时锁定利润。相反一旦菜价下跌或者是出现卖菜难的情形，亏本倒是常事。

浙江省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农业园区负责人对记者说：“打个比方吧，我们种的菜卖到4元钱1公斤时，菜贩到菜场上每斤要加3元钱卖到7元钱1公斤；菜跌到2元1公斤的时候，经过菜贩子几道倒手后，卖出去

时每公斤还是要加3元。菜价无论大涨还是大跌，利润永远有保证的是菜贩，种菜的和消费者则占不到便宜。”

普通百姓吃菜，一年贵似一年

一位杭州消费者告诉记者，总体上感觉吃菜是一年贵似一年。这位消费者算了一笔账，“茭白去年6元1公斤，今年要8元。家里3口人吃饭全买素菜的话，去年10元钱就够一顿饭，今年要多花两三元钱。”

农业部门人士分析说，除社会总物价水平在上升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蔬菜生产成本在节节攀升。在浙江嘉兴，有蔬菜种植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土地价格每年都在上涨，城郊适合种菜的土地流转价格每亩达到了上千元。今年以来，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也上涨很快，整个成本比去年提高了差不多20%。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经济研究室李崇光教授的研究显示，自2003年后我国大中城市蔬菜每亩平均生产成本增长迅速，目前每亩平均成本已超过2200元，跟2003年相比增加了70%左右，远高于同期蔬菜净收益的增长速度。

浙江省农业厅首席蔬菜专家赵建阳称，成本上涨对菜价的影响是刚性、不可逆转的。

集约化程度低，产销成本过高

农业专家指出，透过菜价波动背后的怪现象可以发现，当前百姓“吃

菜贵”并非全是“天气原因”，还同当前粗放的蔬菜小生产体系有关。因为小生产的涨价因素多，多层流通环节也会抬高菜价。

赵建阳等人认为，灾害性天气给蔬菜生产带来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但是粗放的产销体系带给菜价成本的上涨，可以通过努力加以消除。

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像抓粮食、抓生猪生产一样，加大对蔬菜生产的扶持力度。把城市建设征用菜地时收取的蔬菜基地补偿金，真正用于发展新的蔬菜生产基地。

其次，要加大蔬菜生产的科技投入，提供更多高品质的蔬菜品种，以及高效的栽培和病虫害防治技术。以往我国提高蔬菜产量主要靠扩大菜田面积，黄瓜、西红柿等主要蔬菜单产不及发达国家一半。在菜田面积不可能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科技投入推动粗放的蔬菜生产提高单产和效益迫在眉睫。

另外，赵建阳还建议：“通过发展形式多样的蔬菜专业合作社，提高菜农组织化程度以及和市场对接的能力。政府可以考虑在蔬菜产销中如何提高超市的积极性，开展农超对接，尽量减少中间交易环节，保证菜价合理涨跌。”(据新华社电)

